

怀念恩师王仲荦教授

刘统

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的风气,对先生也有影响。1935 年,开明书店印行了王伯祥先生编辑的《二十五史补编》,汇集乾嘉以来的学术成果。先生年轻气盛,开始着手编写《北周职官志》和《北周地理志》。当年这些努力,绝对没有任何功利可言。

1986 年初夏的一个晚上,王仲荦教授在书房突发心肌梗塞,再也没有醒来。我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书,惊悉噩耗,当夜乘火车返回济南,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。先生面色安详,如同睡去。岁月流逝,先生伏案疾书的形象,仍时时在我眼前重现。先生的教诲,至今铭记在心。

先生祖籍浙江余姚,号称“文献名邦”,他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,做了章太炎先生门下弟子。当时太炎先生表面上不问政事,专心讲学,实际上仍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先生从太炎先生那里既得了经学真传,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又受到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教育。受业 6 年,对先生以后的学术发展,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先生首先是一位爱国者,对祖国和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当年先生陪伴太炎师到苏州和无锡讲授经学,大家都以为太炎先生在复古。其实太炎先生认为:多读经史可以“保国性”。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,临终遗嘱说:“设有异族入主中夏,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。”对此,先生铭记在心,并传授给我们这些晚辈。

先生的青年时代,是在国难和家难中度过的。抗战时期,家乡被日军占领,辗转流亡到云南、重庆。颠沛流离之中,他手头只有一部《资治通鉴》,躲空袭警报时也带在身边。苦难的生活,使他对乱世有切身的体会,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。先生后来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,熟读《通鉴》是一个起因。

我曾请教先生:为什么选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?先生给我讲了两点:一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。造成这种动荡的原因,过去归咎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互相残杀。其实《尚书》中“取乱侮亡”的典故最能说明问题,“一个国家,一个政权,如果内部安定团结的话,无论敌人势力怎样强大,

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。十六国时期,前赵进攻前凉,前赵刘曜有二十八万军队。前凉张茂虽然只有几万军队,但内部和睦,使敌无隙可乘。后来后赵主石虎也动员了十多万军队进攻前凉,还是攻不下来。相反,兵力虽然强大,如果内部充满矛盾,像前秦主苻坚统率八十七万人大举南下,同只有八万人的晋兵会战于淝水,也一败涂地。所以,只要自己内部安定团结,别人就不敢轻易欺侮自己。这个历史教训,我们应该好好记取。”这段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肺腑之言,写进了《魏晋南北朝史》的序言中。

作为一个历史学家,最重要的是史德。只有品德高尚正直的人,才能写出不朽的著作。十年动乱中,先生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。客居京华,耳闻目睹“文革”的种种倒行逆施和造成的危害,先生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。他写下了许多诗篇,或咏史,或感事,表达他的内心感情。

1976 年清明节,他到天安门广场看到群众悼念周总理,声讨“四人帮”的壮观场面,写下《无题》一首:

天安门外花如雪,
烈士碑成堕泪碑。
总理有灵应喜甚,
中华个个好男儿。
当年 10 月,粉碎“四人帮”

的消息传来,先生为之精神振奋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走上了光明之路,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年底,先生又写了《送丙辰年》一首:

山崩地坼史无前,
真是黄杨厄闰年。
云散苍梧人落泪,
星乘箕尾杞忧天。
已闻西内诛韦武,
更喜尚冠迎汉宣。
新令初颁生业重,
伫看花柳满前川。

二

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成就,为国内学术界公认。我常常问起先生的治学方法。先生以为:治学应当有侧重,有专长。但就研究历史来说,如果自己划地为牢,只读一个断代的史籍,则是不应该的。他的治学就曾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。

青年时代,先生喜爱中国古典文学,18 岁就开始注《西昆酬唱集》。这是北宋杨亿等人唱和的一本诗集,诗中用典甚多。为了注这部诗集,他广泛阅读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几十部古籍和大部头类书《初学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佩文韵府》等著作,从中寻觅出一条条典故。



王仲荦(1913—1986)

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的风气,对先生也有影响。1935 年,开明书店印行了王伯祥先生编辑的《二十五史补编》,汇集乾嘉以来的学术成果。先生年轻气盛,开始着手编写《北周职官志》(即《北周六典》)和《北周地理志》。这两部长达百万字的初稿,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。当年这些努力,绝对没有任何功利可言。如果他去投考一个名牌大学或出国留学,可能带来更多的实惠。但他没有考虑过这些,只是对读书感到有乐趣。先生晚年谈起这个过程,感慨地说:学业的基础,全靠青年时代的努力。捷径是没有的,只有老老实实地多读书,读懂书,才能有所成就。

先生不仅博览群书,一些重要史籍,他是反复精读的。抗战时期在云南、重庆,他手头唯有一部《资治通鉴》。读得次数多了,越读越有味道。司马光对史料的取舍和考异,起到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作用,尤其是唐代历史,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。胡三省的解释严密精当,为《资治通鉴》锦上添花。我 1978 年投考先生的研究生,口试完后他对我们这些考生说:“要好好读《资治通鉴》,我已经读了十八遍,现在有问题还要查它。”当时我们都惊叹不已,后来先生著《隋唐五代史》,案头一直摆着《资

治通鉴》,随时翻阅。

先生的勤奋也体现在教学上。建国后他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南北朝隋唐史课程,在很短时间内写成 80 万字的讲义。我问先生为何要写这么厚的讲义,他风趣地说:我一口上海话,唯恐北方学生听不懂,因而讲义写得详细,为的是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。先生的敬业精神,由此可见。

先生在治学道路上从不满足,总是不知疲倦地吸收新资料,探索新问题。晚年在修订和撰写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两部大作时,正史、典章、笔记、碑刻、文集、出土文物等方面的资料,都力求穷尽,不使遗漏。写唐代经济和中外交流时,山东大学图书馆刚好购买了一套敦煌文书缩微胶卷。先生年事已高,去图书馆五楼阅读胶卷实在困难。他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馆长,请求特殊照顾。我从馆里借出他所需胶卷和一部显微阅读器,搬到他的书桌上。他不顾眼睛高度近视,吃力地一边阅读,一边用笔抄录。有一次读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》,文书上的字迹模糊不清,还有唐人自造的“简化字”。他反复辨认,直到这些字被一一认清为止。

先生读书涉猎很广,对材料的收集也务求完备。举例来说:《隋唐五代史》中写到唐代水利,正文不过几千字。然而在后面的注释中,先生将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《元和郡县志》《唐会要》《舆地纪胜》《读史方輿记要》等书中所有关于唐代水利设施的资料,按年代排列了几百条,长达数万字。又如写到唐代行市,书中列举了幽州范阳郡的 20 多行,仅几十字。从注释中可以看到:这些资料来源是先生从《房山石经题记》中一点一滴摘录出来的。这又要花费多少功夫!先生的勤奋,由此可见。

三

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: